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新论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LILUN TIXI XINLUN

田克勤 等 /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新论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LILUN TIXI XINLUN

田克勤 李彩华 李婧 孙成武 黄桂英 刘洪森 /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装帧设计:林芝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田克勤 等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01-016120-4

I. ①中… II. ①田…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0525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

ZHONGGUO TESE SHEHUI LILUN TIXI XINLUN

田克勤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4.75

字数:540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16120-4 定价:10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新发展·····	1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 ·····	9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基本脉络 ·····	9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主要内容 ·····	126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重要意义 ·····	163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 ·····	170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基本脉络 ·····	17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主要内容 ·····	181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重要意义 ·····	217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 ·····	227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基本脉络 ·····	227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主要内容 ·····	24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重要意义 ·····	267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形成发展 ·····	28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 ·····	28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	299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意义 ·····	315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发展·····	32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形成发展的基本 脉络·····	324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33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 意义·····	349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	36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基本 脉络·····	36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主要 内容·····	373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重要 意义·····	393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理论的丰富发展·····	399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理论丰富发展的基本脉络·····	39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理论丰富发展的主要内容·····	41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理论丰富发展的重要意义·····	423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交往理论的丰富发展·····	435
一、国际局势新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交往理论丰 富发展的基本脉络·····	43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交往理论丰富发展的主要内容·····	45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交往理论丰富发展的重要意义·····	468
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	47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基本脉络·····	474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主要内容·····	49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丰富发展的重要意义	537
后 记	546

导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新概括新发展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不仅有大批成果问世,而且研究领域也已相当广泛。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前提、哲学基础、创新形态、基本原则和特征等,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丰富和发展,尚缺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本课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发表数十篇有影响的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集中对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和阐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这就告诉我们,深刻理解和掌握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基本精神,首先必须认真考察这一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基础和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这是从理论形成发展思想渊源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理论背景所作的概括。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透视和剖析,从逻辑上对未来社会作出了一系列推测和设想。这些科学设想,为后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先导。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社会发展的未来时,把着眼点主要放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曾设想并多次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北美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发生。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狭隘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激化,并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引发社会主义革命。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一个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西方不亮东方亮”,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侵蚀下,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革命形势日益明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注意研究东方国家的革命形势,切入点俄国。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非西欧化问题。他认为,不应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成社会一般发展的历史,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1881年,在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出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不仅是马克思晚年思考的焦点,也是恩格斯晚年探索的中心课题之一。在马克思逝世前后共20年的时间里,恩格斯始终关注着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诸如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及其“导言”,《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跋》，以及 19 世纪 90 年代写给丹尼尔逊等人的信等，都阐述了他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低级阶段不能解决生产力高级阶段的任务，生产力发展的次序是依次由低级不断向高级递进，不能跳过这种过程的某个阶段。但恩格斯又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及其积极支持下，落后国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某些苦难和争斗，缩短发展的历史进程。即从社会发展模式看，只要具备一定的国际条件，经过社会革命，落后国家可以跳跃式地向前发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由此可见，恩格斯既坚持了社会生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承认社会发展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把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了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的依据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及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它体现了世界历史总体发展进程与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统一，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一元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他们把世界历史条件下人类交往的普遍化作为自己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即认为人类及社会的历史变成世界历史，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创造并促进了人类交往的普遍化和世界化。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所有国家或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都在国际交往中打上世界历史总体发展的烙印。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才能出现的社会主义前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了东方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甚至是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变成全人类共同趋向的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理论先导。

第二，列宁在 20 世纪初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作用下，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资本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学说，并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列宁根据这种新变化，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更加明显,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上迅速赶上和超过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跳跃式的发展。然而,在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已经瓜分完毕的情况下,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战争势必削弱帝国主义自身,从而在帝国主义链条上出现薄弱环节,造成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从革命危机最严重、革命形势最成熟的国家突破并取得胜利。相反,由于帝国主义统治力量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不平衡,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则是不可能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特别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东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更主要的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及其实践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二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就是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6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模式的过程中,曾设想并实践了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以前制定的政策同俄国实际相脱节,没有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来是党的纲领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列宁深刻地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的体制超越了俄国社会当时的发展阶段。他认为,俄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较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人们力不能及的。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做些让步和退却,那新生的政权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从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实际出发,通过市场、商业的作用,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牢固的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采取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因此,它不仅是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而且为一切小农占

优势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展示了正确的途径。

第三,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坚定地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由于过早地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等原因,最终形成了一种以高度集中统一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前提,是否定、或者说是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而形成一个与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相左的模式。从1928年开始,在联共(布)党内爆发了斯大林同布哈林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继续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问题。1928年8月,布哈林在谈到同斯大林的分歧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及基础是市场关系的存在。他坚决主张在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前提下发展“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市场关系,发展货币经济。而斯大林在争论中则声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了,市场和货币经济不适合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29年12月,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结论”中讲道:“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①

“斯大林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弊端的根源就在于,它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导致了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列宁“新经济政策”这些创造性思想的背离,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绝对化的错误,违背了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从毛泽东晚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邓小平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终于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所提供的正确思路上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及列宁的新贡献为邓小平理论及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先导。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根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根据。这是从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历史经验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基本条件所作的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

^①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 页。

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既指明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与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又指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既指明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卓越贡献,又指明了江泽民、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推进的重要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伟大目标。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个艰巨的历程。对实现这一任务的时间,毛泽东曾有过多种设想。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我看是不行的。”^①随后,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两步走”的设想。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问题。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完成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过去的政治革命到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转变,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明确提出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并多次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不仅揭示了新的革命的实质,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后来长期曲折发展的历史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不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由于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心不坚定,一遇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而在思想路线上又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方向。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坚持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需要一个继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应该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同建成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②这个思想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实际上已开始突破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苏共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禁区,即改变了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分阶段的比较短暂的时期的观点,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先导。

第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机械照搬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这种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要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

②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4页。

系,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打破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关系;要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民主、安定的政治环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要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包括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等正确的方针。

应当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上述重要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尽管它当时还不是很完善的,并且不少思想后来也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但毕竟是提出来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应该对这些成果采取轻率的态度,而应加以珍惜。同时,就探索的动机来说,党始终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加以结合,走适合本国情况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点更应当充分加以肯定。当然,这一时期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种种原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局限。

首先,这一探索总体上还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毛泽东从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中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而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点的道路。同时,他也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暴露出来的问题中意识到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决心另辟蹊径,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也先后发生了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严重错误,使探索偏离了原来正确的轨道。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①

其次,探索中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在实践中未得到很好坚持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背离。毛泽东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技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等正确思想,但后来又否定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还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提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在实践中,却把一些本来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提出要努力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而在实践中却又习惯套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群众运动、政治动员的方法来进行经济建设,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再次,探索中错误倾向的逐步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主要是指: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生产力上的急于求成与变革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1959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将其作为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此后又错误地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错误的政治批判。“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无论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观点,还是不正确的甚至错误的认识,从整体上说,都属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对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财富,它为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发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